

不只是多元—— 清前期「清文鑑系列」辭書修纂與歷史書寫

■ 林士鉉

清前期編纂多語種合璧辭書，樹立顯而易見的多語種碑匾，又長期經營熱河避暑山莊，維繫其北亞文化特質，加上政教關係不拘一格、旗人與民人有別、藩部與郡縣體制之明顯差異等等多元特質，因此，一般將清政權定位為一個多元族群政權（a multinational polity）。然而，我們也應思考當時所追求與實踐的，是否就是一般所說的多元？以下主要以「清文鑑系列」為代表的多語種相關辭書進行討論。

保存滿語與翻譯標準化——「清文鑑系列」之發展

乾隆年間（1736-1795）是官方編纂辭書的高峰，強調滿、漢、蒙、藏、回等五族語文之音義能夠相互對譯，臻至同文之治。無論是多部以「清文鑑」為名的辭書，或是應用於地域和族群的《西域同文志》，以滿、蒙、漢、藏、回、托忒蒙文等多達六種語文，編寫西域地名、人名之地理和譜系辭典，都是以滿洲語文為首，作為轉譯原語的核心語種。¹

以滿文為核心的辭書，其肇始之作是康熙皇帝（1661-1722 在位）敕纂的《御製清文鑑》這部滿文單語辭書。據《起居注冊》記載，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四月，康熙皇帝因恐滿人漸習漢語，忘卻滿語根本，並且考慮到後生子弟的滿、漢翻譯用字能否恰當，萌生編纂以滿文解釋滿文字詞之專書。² 這部辭書的修訂期程居然超過三十五年，康熙皇帝親自逐篇審訂，一直到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才告成，命名曰《清文鑑》（*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*）。（圖1）

這是一本分類辭書，約有一萬二千餘條詞語，且不少詞條附有摘引自漢文經史典籍之例句，將之譯作滿文，目的是希望顯示該滿文字詞的正確用法。此部辭書出版不久後還被滿人改編刊行，例如，董佳明鐸註《音漢清文鑑》（雍正十三年，1735）（圖2）、宗室屯圖《一學三貫清文鑑》（乾隆十一年，1746），都加入漢文對譯；可見漢文經典及滿、漢雙語的確有其實用性。

《御製清文鑑》出版二年後，即首次跨出單語類型，康熙皇帝諭令將之譯作蒙古文，是為《御製滿洲蒙古合璧清文鑑》，費時十年才完成；此書的合璧形式是一邊寫滿文，一邊寫蒙古文，但已將引自漢文經典的例句刪除。此辭書在乾隆八年（1743）改寫重刊，題作《御製滿蒙文鑑》，仍是滿蒙雙語，和原著的差異主要是將蒙古文全部改以滿文音寫，也就是用滿文字母拼寫蒙古文，認為如此一來更容易念讀。音寫蒙文反轉了以蒙古文字拼寫滿語（女真語）之滿文造字源起。此書也是乾隆皇帝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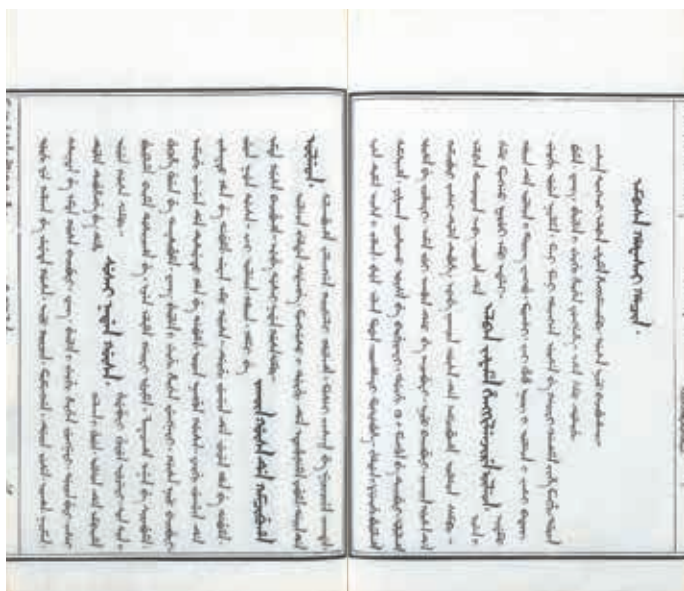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(左) 清 聖祖敕纂 《御製清文鑑》卷2 〈旗分佐領類·五十七旗、附隸八旗厄魯特、朝貢厄魯特〉 清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刊滿文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滿002464~0024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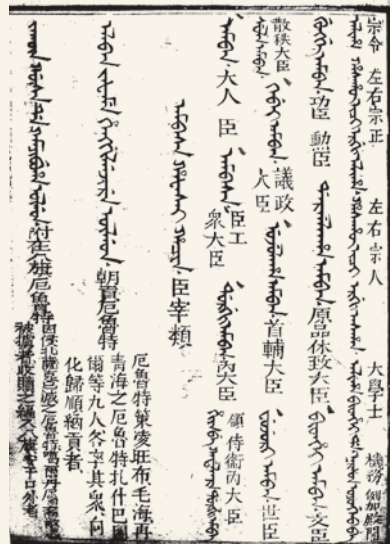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(右) 清 重佳明錄註 《音漢清文鑑》卷2 〈附在八旗厄魯特、朝貢厄魯特、朝貢厄魯特〉 雍正十三年 (1735) 宏文閣刻本 天理圖書館藏 取自Microfilmed by Yushodo Film Publications Ltd., Tokyo. 1966. Reel No. 39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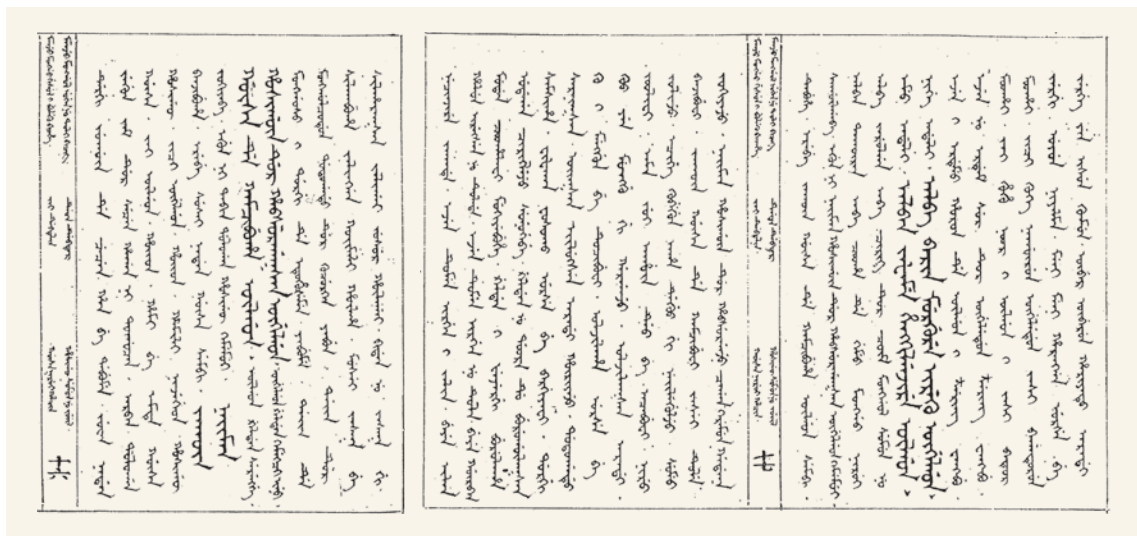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清 高宗敕纂 《御製滿蒙文鑑》卷2 〈附隸八旗厄魯特、朝貢厄魯特部分〉 乾隆八年 (1743) 武英殿刻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,《故宮珍本叢刊》,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1,冊721,頁87-88。

習蒙古語文的重要教材。(圖3)

事實上,滿文創製的動機,直接和蒙、漢語文有關,是多種語文互動的產物。據《實錄》記載(明萬曆二十七年,1599),清太祖努爾

哈齊(1559-1626)鑑於當時女真社會,尚無本族文字,往來文書均使用蒙、漢文;而蒙、漢人念蒙、漢文,無論是否學過蒙、漢文,都能明瞭,但是女真未學之人,則不能明白。因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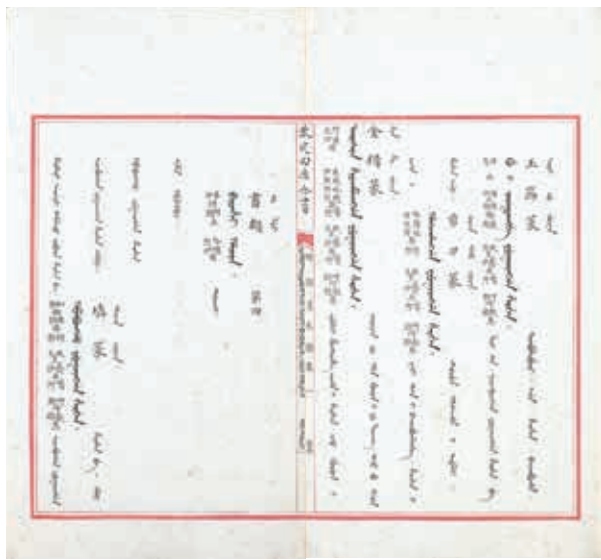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(左) 清 高宗敕纂 《御製增訂清文鑑·補編》卷1 〈書類·金錯篆、玉筋篆〉 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52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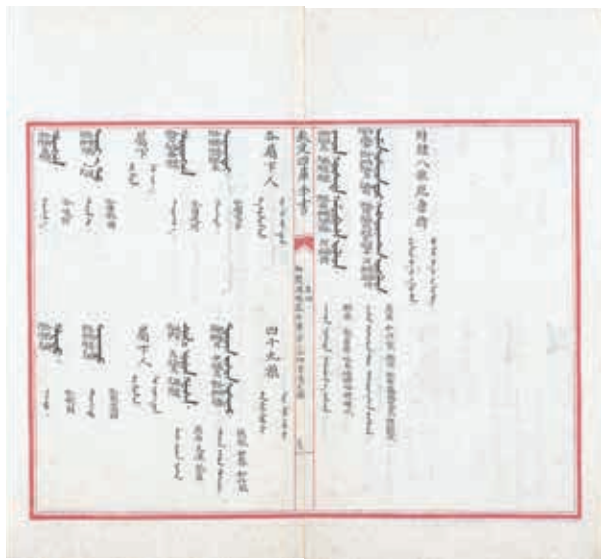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(右) 清 高宗敕纂 《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》卷4 〈四十九旗、附隸八旗厄魯特〉 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5315

諭令噶蓋(?-1600)、額爾德尼(1592-1634)二位大臣必須創造本族文字；他亟欲改變用外文記錄本國事務的困境，因而親自指導造字，直接以蒙古文字拼寫滿語。³後來經過字母規範化及添加圈點符號，而成為日後通用的滿文。

在乾隆皇帝開始學習蒙古語文不久，據《上諭檔》記載，乾隆十五年(1750)便開始著手增訂康熙《御製清文鑑》，以長達二十年的時間，完成《御製增訂清文鑑》。此書保留了以滿文解釋滿文的主體內容，但為免招致牽強附會便刪去了原書裡的漢籍經典例句；增加了漢文詞條，成為一部滿、漢文詞條相互對譯和注音的辭書。此外，修訂舊解釋、擴充不少新事物和傳統經典的滿文新詞彙，也就是當時的「新清語」。(圖4)

康熙《御製清文鑑》、乾隆《御製增訂清文鑑》編纂過程十分漫長，除了有豐富的詞彙反映各種知識觀念交匯之現象，也附有《總綱》，

其作用是可依滿文字頭(母音和音節)檢索。行文排版亦深具特色，滿漢文詞條、對音及解釋為了前後文相互搭配，而必須精算字數空間，適時換行，版面設計十分精良。

從《御製增訂清文鑑》開始，又編纂多語合璧辭書，據以規範翻譯用詞。除了出版針對行政公務方面的實用辭書《清漢對音字式》(乾隆三十七年，1772)，係避免翻譯用詞附會帶有歧視意味的漢語。編纂出版《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》(乾隆四十五年，1780)，審訂三種族語音韻，相互對音，一舉三得(圖5)；將此原則應用於《遼金元三史國語解》(乾隆四十六年，1781)。《四體合璧清文鑑》(乾隆五十九年，1794)，以滿、漢、蒙、藏四語字義對照，但僅以滿文注音漢字。(圖6)而未出版的《五體清文鑑》(乾隆五十六年，1791)則是加入回字，特殊之處是不但以滿文對音藏文，還轉寫藏文，也以滿文

對音回字。此辭書雖然在十八世紀沒有出版，原因待考，但在二十世紀出版後，廣為學界重視。（圖7）

和回字有關的辭書其實早在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編纂《西域同文志》出現，但它詞條是包括天山南、北及青海、西藏等大西域範圍內的地理、族群譜系。滿文作為原語的對音橋樑，解釋以漢文表示，不像「清文鑑系列」圖書，詞條以滿文或蒙文解釋，並沒有編纂藏文、回字解釋的辭書。例如，《西域同文志》岡底斯里的原語為藏語及梵語，首先以滿文音譯（gangdisri），再標注漢字、考釋，其後為漢字三合切音及其餘諸語音譯。（圖8）至於規範化作用其實也有例外，《五體清文鑑》的君類詞彙：天子、皇帝、君、主等，其中「皇帝」源於漢語，滿語和其他諸語均直接音譯；滿語原語 han

對應漢語「君」，其他諸語各有對譯之詞。但是寶璽「皇帝之寶」，滿文印文沿襲入關前的印文，使用 han，而非 hūwangdi，並不規範。（圖7、9）可見，不論是辭書的語文種類或是翻譯的選詞用字，均是因應現實需求而選擇的結果。

被放棄深究與被長期堅持的語言文字

上述辭書中的滿、蒙、漢、藏、回等語言文字，均有相對應的族群與地域，在清朝實際統治的領土範圍內，可視為清政權的主體文化群體；而包括臺灣的生、熟番及西南地區的苗人，乃至於關東地區的鄂倫春、赫哲、庫野等等沒有文字體系的族群，卻是被排除在這種地位之外。⁴ 這反映有歷史典籍可徵的文字，及該族群所據有的時空分量，才成為清朝關注的重點。再參考避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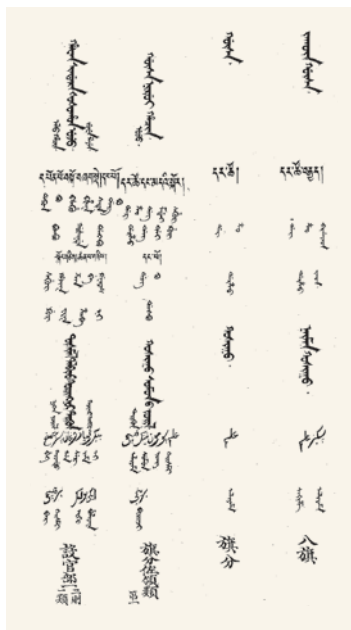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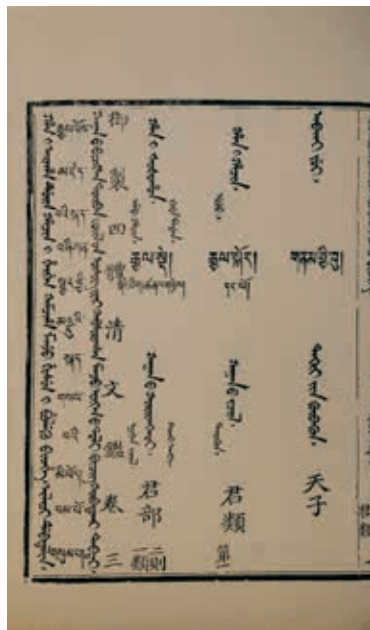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（左）清 高宗敕纂《四體合璧清文鑑》卷3〈君部·君類·天子〉 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刻本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，《同文之盛——清宮藏民族語文辭典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9，頁121。

圖7（右）清 高宗敕纂《御製五體清文鑑》卷3〈君類·天子·皇帝·君、主〉〈旗分佐領類·旗分、八旗·平定準噶爾厄魯特、新投誠回子、平定回子、進貢回子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《御製五體清文鑑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1957，冊1，頁251-25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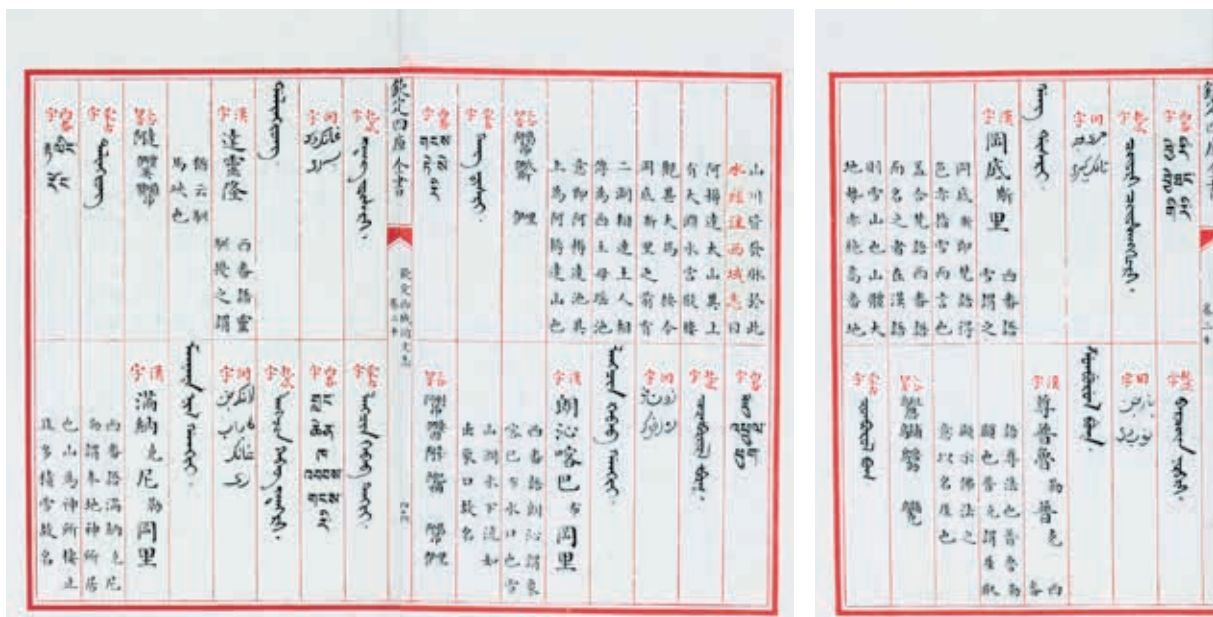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清 高宗敕纂 《欽定西域同文志》卷20 〈岡底斯里〉 清乾隆間四庫全書書要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004243



圖9 《大清國遣使出洋考察致英國國書》 局部 滿漢篆文皇帝之寶璽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關000059

山莊正門，名之「麗正門」，取意於《易經·離卦》：「日月麗乎天，百穀草木麗乎土，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」，以日月普照及表示南方之位取名，門額題字以滿、蒙、漢、藏、回字五體文字表示，深具經典文化內涵，漢文經典早為滿人菁英熟知。（圖 10）

乾隆年間對於缺乏文字系統或認識不清的

語言，雖未使其佔有重要地位，但不表示不曾關注。包括東北黑龍江沿海一帶、西南四川、雲南、廣西三省，乃至西洋，包括英、法、拉丁、意、葡、德等六種歐洲語，當時都進行過調查蒐集。據《實錄》記載，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九月，乾隆皇帝上諭禮部：

我朝聲教四迄，文軌大同，既有成編，

宜廣為搜輯，加之核正，悉准重考西番書例，分門別類，匯為全書。所有西天及西洋各書，于咸安宮就近查辦，其暹羅、百夷、緬甸、八百、回回、高昌等書，著交與該國附近省分之督撫，令其採集

補正。此外，如海外諸夷並苗疆等處，有各成書體者，一併訪錄，亦照西番體例，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注於本字之下，繕寫進呈，交館勘校，以昭同文盛治。著傳恒、陳大受、那延泰總理其事。

乾隆十五年七月，四川總督策楞（1706-1756）完成此任務後，奏稱已就松潘、茂州、汶川、打箭爐等廳州縣所轄西番、猓羅，其字語「遵照四譯館西番書例，註明音義」，繕寫十一本進呈；⁵而這很可能是因為第一次金川之役（1747-1749）才引起乾隆皇帝對西川邊民的關注。這個規模龐大的蒐集成果，應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《華夷（會同四譯館）譯語》，內容分西域館、西番館、西洋館、百夷館等，現存譯語四十二種七十一冊，原藏軍機處方略館。⁶（圖11）

就在策楞呈交西番、猓羅字語後不久，清宮同樣由軍機處統籌，頒佈圖樣，從蒐集四川西番、猓羅圖像開始，乃至於邊境各省皆按圖樣描繪邊民進呈，由此開啓清宮《職貢圖》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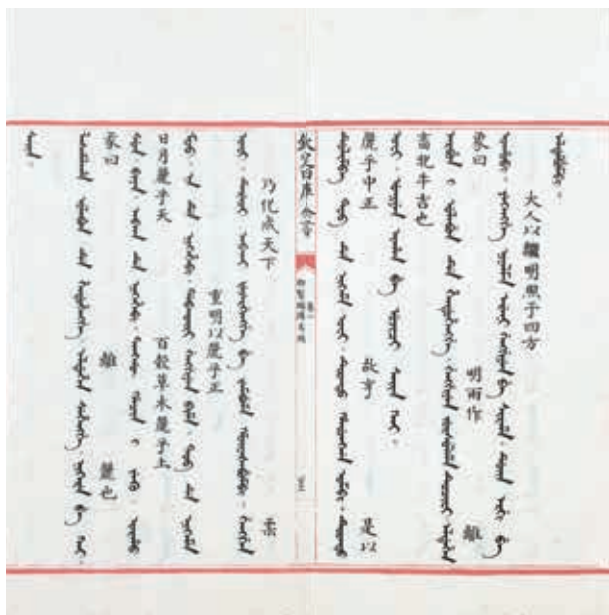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 清 高宗敕譯《續譯五經·御製編譯易經》卷1〈離〉 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4228



圖11 清 高宗敕纂《拉氏諾語》 清乾隆年間抄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春花主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年編「華夷譯語」》，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8，冊18，頁344-345。

畫，至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大致完成，最後完成三百組的職貢成員。⁷我們在清宮《職貢圖》各種卷本、寫本和刻本都可見到的關東地區族群，其中有鄂倫綽（鄂倫春）、奇楞、庫野（庫頁島）、恰喀拉、七姓、赫哲等六族，圖說均描述他們說的是本部族的土話。相較於上述蒐集來的各種譯語，似乎只有具有文字書體的，才是蒐集目標，因此，關東地區極東之邊民很可能沒有留下語言調查的紀錄成果。但至少清宮《職貢圖》在乾隆年間已有刊本，而《華夷譯語》並沒有出版，似乎也沒有進一步深究。蒐集了數十種語文，「分門別類，匯為全書」，保存於軍機處之後，作用似乎十分有限。

從頒布西番體例作為各省語文調查的標準格式，可見西番（西藏）語文在當時具有重要

地位，乃至於包括川藏一帶大、小金川的嘉絨土司族群，清宮也曾進行過語言調查。除了現存《華夷譯語》內存有《嘉絨譯語》，還有包括嘉絨語和滿、蒙、藏、回（維吾爾）並列的《五種語言詞彙集》（manju monggo tanggūt hoise sunja hacin i gisun），⁸全部以滿文對音轉寫，此作可能和上述《嘉絨譯語》有關，也可能是第二次金川之役期間（1771-1776）採集編寫的，這又是一個以滿文作為對音文字的作品。滿文作為一種記錄諸語的工具，除了便於統治者不受文字限制，得以稍通語音，也可視為是上述多種對音辭書的延續。惟最後嘉絨語並沒有具備《五體清文鑑》、《西域同文志》所列諸語的地位。（圖12）

重視西藏語文的表現，更在於上述開啓大



圖12 清 高宗敕編《滿蒙藏嘉維五體字書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，《同文之盛——清宮藏民族語文辭典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9，頁3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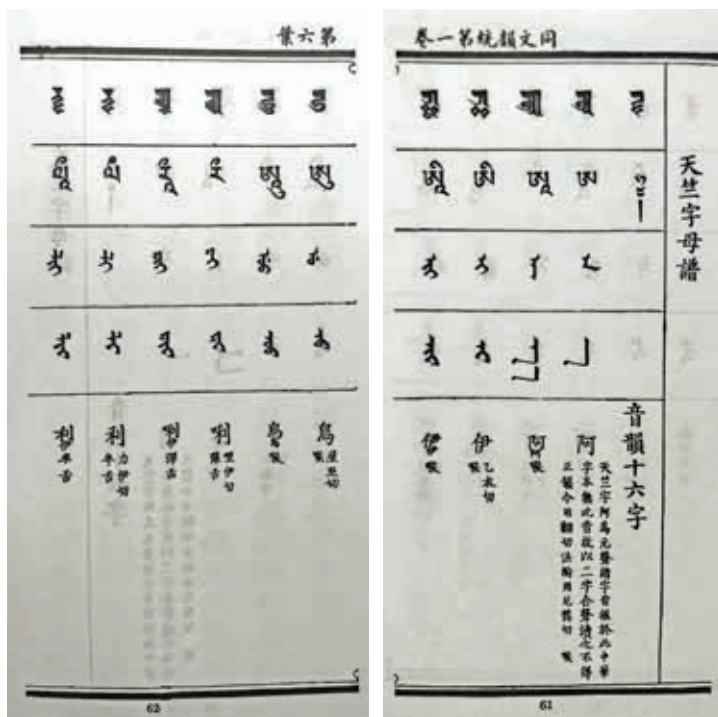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3 清 高宗敕纂《同文韻統》卷1〈天竺字母譜〉 清乾隆內府刻本 民國十八年上海涵芬樓影印 取自清章嘉活佛，《同文韻統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8，頁61-6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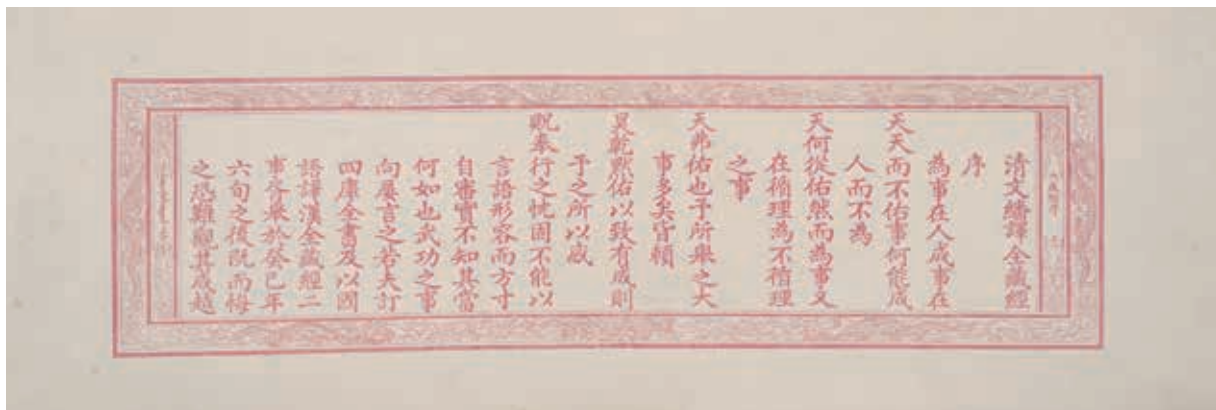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4 清 高宗御譯 《清文繙譯全藏經》第1函 〈清高宗序〉 清乾隆五十五年內府朱印滿文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藏000131

規模蒐集語文之後，不久清宮也開始針對文獻裡的佛經咒語進行規範。清乾隆十五年刊行《同文韻統》，此書基本上以梵、藏、滿、漢四體壁語音辭書，有的版本含有蒙古文；諸語文都以梵音為對音目標；為了完成這個目的，滿文又新創了另一套字母系統，一般稱作滿文阿禮嘎禮字或稱經咒新字。後來成立經咒館，編輯《御製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》，比勘全部漢、藏文藏經之經咒，以求內容完整。該書御製序文題寫於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，刊刻於三十八年（1773）。經咒比勘是佛學學術工作，和前述各種族語相互對音的要求，實為一體兩面。除了經咒，也編印過佛學詞彙的分類辭書《（五譯合璧）集要》，只是知名度不如《清文鑑》、《同文韻統》。（圖13）

編輯《大藏全咒》同時還有另一項佛學學術工作，就是成立清字經館，編譯《清文翻譯全藏經》，即一般說的《滿文大藏經》。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開始翻譯，其後陸續雕版刷印，御製序文寫於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，而全部刷印、裝潢工作直到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才告竣。⁹ 乾隆皇帝將之與《四庫全書》並列為其生平，也可說是清朝開國以來，最重要的兩項文化事業。

以滿文譯編的經書聖典，繼《五經四書》之後，最終完成《滿文大藏經》。（圖14）

康熙初年敕纂的《御製清文鑑》和乾隆末年編譯完成的《清文翻譯全藏經》，恰好都是滿文單語形式的大型作品，其間大約相隔一百二十年，即使編輯刊印多語文合璧圖書，滿文都據有首要地位，這顯示清朝的多元族群及語言文字現象，滿洲語文的角色應是最為重要考量。上述「清文鑑系列」發展，可知滿、蒙語文關係密切，除了刊印《蒙古文大藏經》（甘珠爾、丹珠爾），《實錄》除了滿、漢文，也有蒙古文，其地位自然不在話下。另外，西藏、西域語文長期成為清朝的目光焦點，西藏語文的地位與佛學學術及宏揚黃教（西藏佛教格魯派）有關，黃教尤其是安定各部蒙古的重要基礎，而西域回字、托忒蒙古語文地位，則直接來自於清朝用兵西域的結果。

入主西域——多種語文辭書與歷史書寫

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五月，西師大軍拿獲準噶爾汗達瓦齊（?-1759），宣告準噶爾全境蕩平，這是第一次準噶爾之役。先前，康熙皇帝在解決準噶爾汗噶爾丹（1644-1697）入侵喀爾



圖15 清 高宗敕纂 《欽定熱河志》卷120 普寧寺圖 清乾隆辛丑（四十六年）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29379

喀蒙古，曾於多倫諾爾興建彙宗寺（康熙三十年，1691）；乾隆皇帝因此仿效祖父，於避暑山莊北路興建規模宏大的普寧寺。普寧寺仿建自西藏首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，佛、法、僧俱足。據《實錄》記載，普寧寺於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十月才竣工；¹⁰這七年間，發生了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第二次平定準噶爾之役，以及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平定回部之役，此

後便關注如何把西域整併入清朝，同時進行大規模有關平定西域的歷史書寫。

即便第一次平定準噶爾之役並非真正平定，乾隆皇帝題寫於乾隆二十年十月的〈普寧寺碑文〉，以滿、蒙、漢、藏四體文字立於寺內，不僅宣示當時的短暫榮光，還揭示取名「普寧（gubci nikton）」之義：「蓋自是而雪山、蔥嶺，以逮西海，恒河沙數，臣庶咸願安其居，樂其

業，永永普寧云爾。」這裡說的普寧地域是包括青藏高原和西域、內亞。碑文還提到，仿建衛藏桑耶寺於避暑山莊，此二寺並無差別，一如「佛土無差別」，乃至於「西土及震旦，究竟無異同」，也就是西域與中原在清朝統治下俱屬內地，並無差別。可見普寧寺本身就是西征歷史書寫之作，傳達西征歷史書寫之重要理念。（圖15、16）

關於整併西域的歷史書寫作品確實不勝枚舉，遍及官修史部圖書、輿圖、繪畫等等類別，而即使看似僅為規範對音、解釋字詞的「清文鑑系列」，事實上也增添了相關的新詞條。例如，清朝在西域的新屬邦，愛烏罕，其進貢駿馬的專屬嘉名：超耳聽、徠遠騶、月曙驂、凌崑白，除了寫在〈愛烏罕四駿〉貢馬圖卷中，又特別寫入《御製增訂清文鑑》等辭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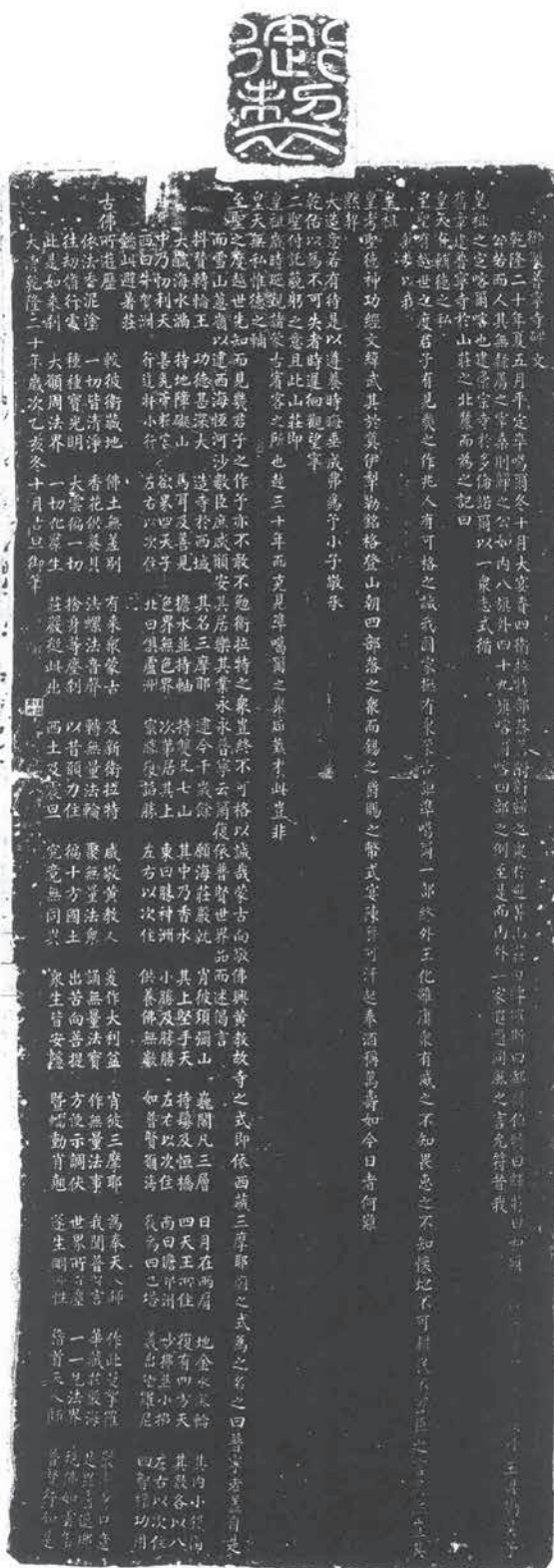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6-1 御製普寧寺碑文 拓片 漢文 取自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，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匯編》，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，冊71，頁6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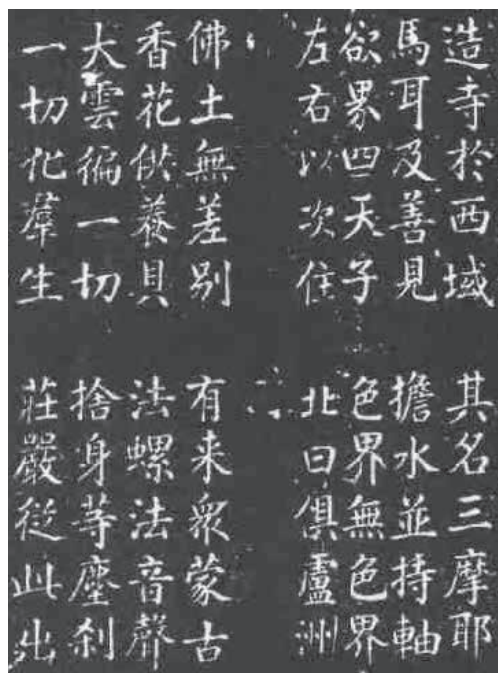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6-2 御製普寧寺碑文 拓片 漢文 局部



圖17-1 清 郎世寧 愛烏罕四駿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049



圖17-2 清 郎世寧 愛烏罕四駿 卷 局部 凌崑白

(圖 17) 此外，對於清初以來直至平定準噶爾、平定回部戰爭結束的戰敗者、歸順者，也成為一組特殊群體辭彙，收入各種《清文鑑》。早在康熙《御製清文鑑》裡，即收入了「四十九旗 (dehi uyun gūsa)」、「五十七旗 (susai nadan gūsa)」，前者是漠南蒙古各部入清後編設的盟旗，後者主要是指漠北蒙古喀爾喀各部，因康熙年間為準噶爾汗國所敗，而成為清朝藩部；更包括「附隸八旗厄魯特 (jakūn gūsa de kamcibuha ūlet)」、「朝貢厄魯特 (alban jafame hengkilenjere ūlet)」，前者主要是準噶爾汗噶爾丹之屬裔，敗逃被擄後，收編於八旗的衛拉特人，後者則是統稱當時投清納貢的厄魯特貴族和青海厄魯特。到了乾隆年間，《御製增訂清文鑑》更是大幅擴充至二十個詞條，收入自清初至乾隆二十四年整併入八旗、藩部系統的所有成員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，即是「平定準噶爾厄魯特 (necihiyeme toktobuha jun gar i ūlet)」、「平定回子 (necihiyeme toktobuha hoise)」，前者主要是準噶爾內部相互殺伐不止，因投誠台吉（蒙古貴族）屢屢請求進兵，故於乾隆二十年用兵，俘虜準噶爾綽羅斯台吉達瓦齊，於太廟獻俘後，



寬有並且封親王，其餘厄魯特人等皆居於伊犁等地，種田，統於伊犁將軍。這裡完全將戰爭原因歸究於準噶爾汗國內亂，和應其降清貴族之請，一如清初攝政王多爾袞（1612-1650）應吳三桂（1612-1678）之請，入山海關擊退稱帝的李自成（1606-1645）。後者則說明平定西域烏什、喀什噶爾、葉爾羌、和闐、阿克蘇、庫車、伊犁、庫爾勒等十餘城回子後，補授阿奇木伯克等官，皆為欽差大臣所管理。這二個以「平定」為名的詞條解釋是用滿文寫的，針對特別群體，其內容也精要的概括汗牛充棟的漢文歷史書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乾隆年間的「清文鑑系列」並沒有改版，這些被征服者的詞條還譯成四體、五體語文，成為歷史名詞，一直流傳下去。（圖 18）

不只是多元而是全部

我們可以從三個面向定位上述乾隆年間辭書。首先，它們是挑選過的語文，幾乎都被收入《四庫全書》的經部小學類，使之在經部權威性地位中具有一定分量。辭書內容首列滿文，同時也把蒙古、西藏、回部等族群，象徵性帶入。如此也可謂反映傳統華夷地位的轉換，非漢族群、邊疆地域並不應該附屬於華夏。第二，

多語文辭書又同時具有審訂音義、翻譯儒、釋、道二家經典，及前朝史書之學術目的。第三，具有歷史書寫之目的，將原為邊患的外族經過武力整併，使之成為八旗、藩部，因此編輯、新創一批反映現實歷史事件的群族詞條，具有歷史詞典性質；事實上，《御製清文鑑》、《御製增訂清文鑑》裡的「滿洲」詞條，解釋內容就是將清太祖的先世接自長白山、定國號滿洲，且逐一列舉被征服的數十個部族名稱。

從「清文鑑系列」等辭書看來，雖然族群語種堪稱多元，但是又不只是多元。和疆域拓殖及經典傳統同時結合的文字，才是清朝更為關注的，除此之外即使曾經稍有調查紀錄，終究未曾進一步深入。如同《西域同文志》御製序文以「天」為例，強調各族語能進行審慎的對等翻譯，即是實踐大同、同文之治；又如《四庫全書》，號稱全書，實為大量徵集，復經過諸多審訂程序，而淘汰、禁燬更多圖書。再如《大藏全咒》，經過比勘漢、藏佛典，經過判別訛誤、審音正字等程序乃得全咒；《清文全藏經》也是以佛語之部為翻譯範圍，並非經、律、論三藏之全譯，但卻以此《全藏經》之完成而號稱佛經自藏、蒙、漢文大藏經之後，四譯為滿洲，大藏終於完全。多元很可能只是表面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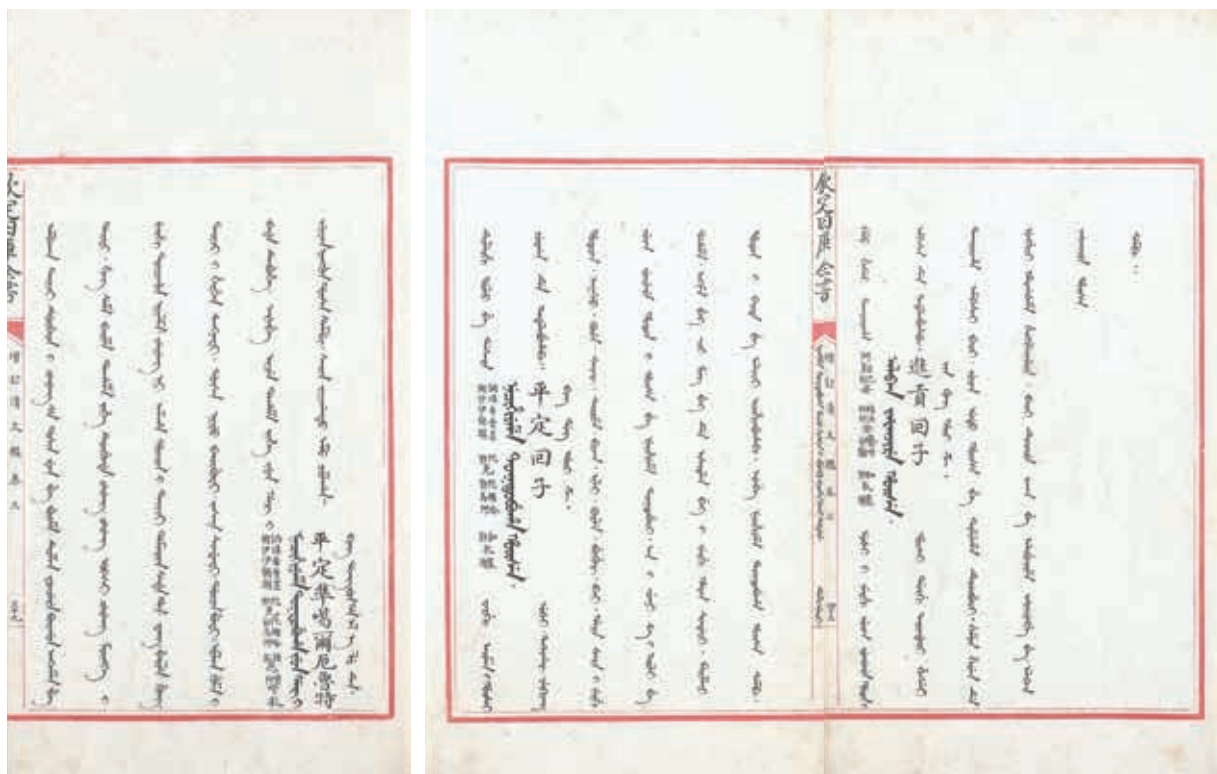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8 清 高宗敕纂，傅恒等奉敕撰 《御製增訂清文鑑》卷3 〈平定準噶爾厄魯特、平定回子〉 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005271

和選擇後的成果，只是皇權和國家菁英達到號稱全部的途徑。

上述普寧寺碑文所傳達的地域空間範圍，並非限於清朝實際管領的疆域，而是及於清朝域外的外藩成員。普寧之普，滿文讀如 gubci，意即全部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十月，就在清軍啓動第二次平定準噶爾之役，追捕逃脫至哈薩克的首要叛將阿睦爾撒納（1723-1757），據《實錄》記載，清朝向哈薩克發佈皇帝諭令，聲明準噶爾全部歸順天朝，現已派大兵捉拿，切勿隱匿；¹¹ 即便當時只是名義上收服、分封衛拉特四部，仍號稱全部；將天山南北納入領土之後，乾隆皇帝於乾隆二十八年特別撰寫〈準噶爾全部紀略〉一文，作為準噶爾、四衛拉特

各族世系，特別是清朝與準噶爾的歷史關係的總綱領，也同樣以全部之名。

當大批同屬衛拉特蒙古成員的土爾扈特等部落，於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自俄國伏爾迦河流域東遷萬里至清朝伊犁境內，清朝決意接納安置；適逢熱河普陀宗乘之廟（布達拉）峻工，除舉行法會，共同聽高僧說法，繪有著名的《萬法歸一圖》，還將其頭目、部眾補繪於《職貢圖》。乾隆皇帝更特意撰寫〈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〉，記錄該部「全部」捨異域，歸順投誠，又申明西域屬邦如哈薩克、布魯特僅能羈縻要求，至於更為遙遠的安集延、巴達克山幾不可聞問，如同膜外概置，僅能要求知足知止，邊界穩定，「豈其盡天所覆，至於海隅，必欲

悉主悉臣，爲我僕屬哉。」針對蒙古可以一再宣示全部統治，面對萬國林立的新天下則只能要求相安無事。

總之，對於清政權長期擴張疆域領土，尤其是征服內亞，要求肅清從東北到東南沿海，以及天山南北、青藏高原，乃至於所謂的全部蒙古，而最終可見滿、漢、蒙、藏、回等文化、族群之多元現象，若以普世帝國（universal empire），或以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」的普世

主義（cosmopolitanism）概念詮釋，確實有一定的合理性；但也應注意，當時對於征服疆域範圍與職貢成員的數量，並非無限，不是擁有多少的數字問題。選擇後的「多元」，主要是爲了具體落實當時「全部」的歷史經驗、政治現實和文化理想；以「清文鑑系列」爲代表的多語種辭書，其實也是歷史書寫的展現，多語種翻譯的文化理想反映乾隆君臣所關心的歷史地位。

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

註釋：

1. 關於「清文鑑系列」各種圖書的編纂歷程，參見林士鉉，《清代蒙古與滿洲政治文化》（臺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，2009），頁279-318。
 2.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，《起居注冊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），冊1，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，頁93-94。
 3. 《清實錄·滿洲實錄》，卷3，己亥歲二月，頁110-112。取自中央研究院《明實錄、朝鮮王朝實錄、清實錄資料庫》<https://hanchi.ihp.sinica.edu.tw/mql/login.html>（檢索日期：2022年10月25日）。
 4. 米華健（James A. Millward），《嘉峪關外：1759-1864年新疆的經濟、民族和清帝國》（*Beyond the pass: economy, ethnicity,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, 1759-1864*）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262。
 5. 《清實錄·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卷324，乾隆十三年九月上壬戌（11日），頁352；卷369，乾隆十五年七月下庚午（30日），頁1085。
 6. 春花、李英、郭金芳，〈清乾隆年編《華夷譯語》述論〉，《故宮學刊》，19輯（2018），頁380-396；黃興濤，〈《咕喇國譯語》的編撰與“西洋館”問題〉，《江海學刊》，2010年5期，頁150-159；北京故宮博物院，《會同四譯館譯語》<https://www.dpm.org.cn/ancient/nation/120753.html>（檢索日期：2022年10月15日）；春花主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年編《華夷譯語》》，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8。
 7. 關於清宮《職貢圖》計畫的綜合性研究，參見賴毓芝，〈圖像帝國：乾隆朝《職貢圖》的製作與帝都呈現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，75期（2012.3），頁6-16。
 8. 《五種語言詞彙集》，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。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，《中國民族古文字圖錄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0），圖版319；故宮博物院編，〈滿蒙藏嘉戎維五體字書〉，收入《同文之盛——清宮藏民族語文辭典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32-22。
 9. 章宏偉，〈《清文繙譯全藏經》書名、修書機構、繙譯刊刻時間考〉，《法鼓佛學學報》，2008年2期，頁311-355。
 10. 《清實錄·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卷673，乾隆二十七年十月甲寅（25日），頁526。
 11. 《清實錄·高宗純皇帝實錄》，卷524，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丙寅（2日），頁599-600。
-